



阶级仇恨记心间

云南人民出版社

階級仇恨記心間

云南省总工会宣传部編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昆明

CAB34/07

封面字：王白莉

階級仇恨記心間

*

云南省总工会宣传部編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昆明书林街100号)

云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新字第0011号

云南人民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3⁸/16 字数58,000
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

统一书号：3116·112
定 价：(5)二角四分

责任编辑：新 路 封面设计：冬 深 校对：志 健

前　　言

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长期的战略任务。

《阶级仇恨記心間》收集了十二个老工人的家史，是一部分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这些家史都是用血泪写成的，是旧中国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血淋淋的写照。

这几篇血泪史记录了老一辈工人在旧社会的种种悲惨遭遇：被压榨、被奴役，失业贫困、饥寒交迫，被毒打、被枪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地主、资本家的凶恶、狠毒的本性；也可以具体地看到在剥削制度下生活过来的老一辈工人曾经遭受了多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经历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和困苦！

本书的作者都是受苦深、觉悟高、劳动好的老工人。他們回忆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对比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有情有节，真人真事，亲切感人。我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讀者认识旧中国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认识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从而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仇恨旧社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和毛主席，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新胜利貢献出更大的力量。

统一书号：3116·112
定 价：二角四分

目 录

理发工人話今昔	昆明市云裳理发室理发师	姜朝林	1
一个女工的控訴	一平浪盐矿女工	万福秀	10
三条人命	昆明鋼鐵公司工人	张正富	21
我家的血泪仇	昆明冶炼厂工人	周 标	28
五十年的遭遇	昆明鐵路局安宁工务段工人	刘长忠	42
阶级仇恨記心間	明良煤矿新平坑	崔应学	50
断手以后	昆明鐵路局开远折返段工人	赵 森	60
父亲的死	昆明机床厂工人	刘金顺	65
到处受折磨	以礼河安装工程队工人	閻錫盛	77
徒工的血泪	昆明机床厂車間副主任	汪向葵	83
从流浪儿到工程师	云南印染厂彝族工人工程师	戴仁理	90
忆苦更知今日甜	昆明机床厂工人	赵学全	99

理发工人話今昔

昆明市云裳理发室理发师 姜朝林

我今年四十三岁，干理发这个行业已经有三十个年头。提起“侍候人”是不是“低人一等”，使我想起了在旧社会十六年的辛酸日子。

三年徒 三年奴

我是建水县人，父母死得早，六七岁就给地主当牛马。后来，地主把我卖到箇旧矿山上当小“砂丁”，干了一年，我受不了资本家的折磨，就逃跑到箇旧城里。十三岁那年，为了找个糊口的地方，我向一家理发店老板一次又一次地恳求，他才收留我当个学徒。

那时候收学徒兴办三件事：请铺保、写师约、赌咒，好不容易！投师约上写的是：“学三年，帮三年；病一天，补一天。损坏工具，日后照赔。天灾人祸师不管，逃跑照算饭食钱。”这哪里是投师约，真是道地的卖身契！晚

上，老板叫我对祖师爷牌位跪下赌咒：“师徒如父子，依师如父母……”他用这套封建迷信办法迷糊我，叫我死心塌地给他当牛马。

“师徒如父子”，没得那么好的事。在旧社会我們常說“三年徒，三年奴”，这是实实在在的。我每天給他家端屎倒尿，烧火煮饭，洗碗扫地，从早苦到晚，还經常挨打。一天两頓飯，我要站在一旁侍候，給老板拿碗添饭、端菜递湯，直到众人都吃归一了，我才得拿筷子，吃桌上残湯剩饭。晚上老板抽大烟，我要給他端茶、买宵夜，到了三更半夜，才得躺倒休息，才睡一小下，天又亮了。

两年过去了，我还没有摸过刀子，老板只是教我练“手功”。晚上，他老两口躺在床上抽大烟，我站在他們床前，双手半举，肘上放一碗水，右手手腕不停地搖动，每天晚上要练三柱香那么久，整得我脚又酸，手又麻，眼泪淌下来都不敢去揩一下，怕挨打。有一天晚上，太累了，站到第三柱香，瞌睡就来了，一不留神肘上的一碗水掉在地上，碗也打烂了。老板勃然大怒，从床上跳下来，一手抓着我的头发，一手朝我身上乱打；打够了，又拿起香火烙我的眼皮。我眼皮上的一块伤疤，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还长不出眉毛。

在旧社会，要想从老板那里学点技术，比上尖刀山还难！开初只叫我給小娃娃剃头，不告訴我怎样起刀，怎样

收刀，可是动作有点差錯，不是扭耳朵就是擰眼皮。有一次，不小心給一个小娃剃出一小点血，老板把我拖到房间里，又打又罵，跪在地上不准起来。为了学点技术，每天晚上，我悄悄地拿出剃刀，在自己的膝盖上刮。更深夜靜，正是睡眠的好时光，我一个人还在小油灯下，在自己的膝盖上來回地刮呀刮。日子久了，膝盖都刮出老茧。我当了三年徒弟，挨了无数次的打罵，才学会了給小娃娃剃个“馬桶蓋”，連鬍子都刮不干淨！

学了三年还得帮三年。老板叫我跟师兄挑扭串街，每天要交一元五角錢才給我們吃飯。这种痛苦生活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跑到蒙自。

生 活 如 花 子

蒙自一家理发店收留了我。老板說我鬍子都不会刮，技术太差，做得一元分給我两角，格外还要我“參师”。

“參师”就是要經常向老板送礼，实际上就是一种剝削。我分得几文血汗錢，扣掉伙食，經常买点大烟、点心及其他东西送老板，月月手中都剩不了几文。我在蒙自干了四年，只掙得一把剪刀和几把剃刀。我的全部家当只是几件烂衣衫、一床破毡子。后来听说在昆明帮人理发工資高，我就約了一个同伴，到开远买了火車票，抱着天大的希望来到昆明。誰知在昆明比在州县上还苦，表面上工資比較

高，可是資本家的剝削花样百出，到头来，还是天天辛辛苦苦，年年缺衣少食。那时候在昆明流行着三句挖苦理发工人的話：“出門像公子，工作像孝子，睡覺像花子。”这三句話，概括了当时我們理发工人的痛苦生活。

我到昆明后，卖掉刀剪和一些值錢的衣物，买了礼物送給当时理發业大把头王有山，他才把我介紹到紅星理發店工作。在紅星理發店苦了三年，才淨得一套进入启华理發室的工作服。当时江浙老板开的理發店表面上工資比較多，但是陈規旧律很多，剝削手段特別毒辣。理發工人給資本家当奴隶，不但要訂卖身合同，而且要自备皮鞋、毛呢褲子、白衬衣，白衬衣左边口袋还要插上一条手絹。沒有这套“公子衣服”是不准上班的。

提起“出門像公子”，我們老一輩的理發工人都不由得心酸落泪。一套工作服，要忍饥挨冻几年，流了多少血汗才換得來！我們“出門像公子”，并不是我們生活富裕，我們是被迫給資本家裝璜門面，招徠顾客。其实，我們生活都十分貧困，往往外表像“公子”，內里像花子，衬衣的衣領和前胸是白洋布，衬衣后背以及汗衣汗褲都是烂的。有时候，买一件衬衣，就将后背剪下来做衣領或手絹。这种苦楚，就像哑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說。

那时也沒有什么“宿舍”，只好睡在地上。工人买不起被子，都是租被子来盖，一个月一块多錢。我是到結婚

那年才买了一床旧棉絮，总算盖上自己的被子。我們从早站到晚，脚站得肿起大碗口粗，手又酸又麻，下班后，累得要死，大家横七竖八躺在地下，就像睡在街头的叫花子。

工資到哪里去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和資本家剝削光了。我在过几个大理发店，明說三七分賬，可是資本家總是挖空心思，用各种手段把你的三成也剝削掉。比如拉你抽大烟、强迫你和他赌博，每逢老板、老板娘、和他們的儿女的生日，要你送礼，每逢除夕，老板家多少娃娃要你送“压岁錢”。最毒辣的是强迫你上賽，或者工資拖延不发，老板把錢拿去做投机生意，結果本来可以买几十斤米的工資，后来只买得几斤米。此外，黃色工会收会費、壯丁費、棺材費……；国民党反动派要收所得稅、戶口稅、保甲捐……。不管你一个月三七分賬分得多少錢，七除八扣，交捐上稅，到头来还是缺穿少吃，儿女啼饥哭塞。1948年我在云裳理发店，老婆帮人做針綫，家中只有一个孩子，可是一家三个人飽一頓餓一頓，穿得破破烂烂的。

失業的痛苦

我們端的是資本家的碗，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被开除。在旧社会，資本家叫你上午走，你不敢留到下午。解放前我在昆明，被資本家赶走了二十多次，尝够了失业的痛苦。长点干到三、四年，短点只干了几天，資本家就把

我赶走。有一回，我在晓东街一家理发店，刚干了三天，有一把好剃刀被人偷了，我大着胆子問資本家一声，他把脸一沉，罵我：“放你的狗屁！”怒冲冲拿起笔就在牌子上把我的名字划了一个圈。我又被开除了。

我在启华理发店給老板当了三年多牛馬，可是当我害病时，老板反臉不认人，把脸拉得长长的对我說：“我这里不是医院”，把我开革了。我在昆明无亲无故，只好到东寺街一家鸡毛小店住下，自己熬药，自己煮飯，孤苦伶仃的。这次病了一个多月，把皮鞋、毛呢褲子全套“公子衣服”都卖光了。病刚好，我就拖着瘦弱的身子到启华理发店要求上班，不料老板冷冷地回我一句：“人滿了，到別家去看看。”就把我推出門。我走出店門，想到身边沒有一个錢，衣食沒得着落，眼睛涌滿了泪水。

在旧社会，許多理发工人都经历过失业的悲慘遭遇。我认得一个理发师，下江人，技术非常好，因为給資本家送礼送少了被开除。失业后，他把值錢的衣物都卖光了，最后流落街头当叫花子，晚上常常歇在当时“青年会”的墙脚下。每年一过阴历十二月，理发涨价了，資本家才拉他进来，給他穿上皮鞋和西装，迫他从早到晚拚命干活。資本家一直叫他干到除夕晚上，然后又把他的西装和皮鞋脱下来，一脚把他踢出店門。正当万家灯火，資本家在花天酒地过年的深夜，他又在街头流浪。現在想起这种叫花

子生活就心酸。

处处受侮辱

在旧社会，理发工人被人罵为“下九流”、“刮刮匠”，誰都瞧不起，被打被罵更是常事。連我自己的外公外婆知道我在昆明干理发，也不好意思承认我是他們的外孙。我們說亲时都不敢实說自己是干理发的，怕人家另眼看待。那时誰家願意把姑娘嫁給理发工人！

理发工人不但受資本家的气，还得挨国民党反动軍警、反动官僚以及地痞流氓的打罵。我們虽然陪着笑脸，口称“老爷”，工作得像“孝子”，可是一不留神，往往要挨耳光甚至被打得半死。我在启华理发店时，有一天，国民党偵緝队长周伯軒带着卫兵大搖大摆走进来，就在我的椅子坐下。这个家伙把脚蹠得高高的，头死死地粘在靠背上，像猪一样吹着鼻音。每次扶他的头，我都是心惊胆战，生怕惹祸。快要刮鬍子时，一时慌亂，我錯拿了鬍子油，一擦在鬍子上，他突然睜开眼睛，罵声：“干什么！瞎了眼睛！”就打了我两个耳光，接着又是一脚，把我踢出二三尺远。老板連忙給这个大特务赔不是。我爬起来对老板說：“算了，请別人給他理吧。”这个混蛋竟大吼道：“偏要你給我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吞下眼泪，又小心翼翼地給他刮鬍子。我在大美理发店时，一个同事叫蓝应成，有

一次給一个反动軍官理发。理完后，这个反动軍官摸摸鬚子，破口大罵：“媽的，怎么不給我刮干净？”就揮拳打蓝应成两个耳光。我們都十分气忿，蓝应成也很生气，就回答他說：“刮不干净再刮嘛，为什么动手打人？”这个反动軍官頓時十分恼怒，对两个卫兵大喊：“揍死这个下流貨！”两个卫兵用枪托把蓝应成打得遍身青肿，口中淌血。那时候刀把子在人家手上，我們虽然十分憤恨，却无法救救他。蓝应成回家后，拖了三个多月就死了，家里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在旧社会，这种冤枉事經常会碰到，可是有冤无处訴，碰着就算你倒霉。

今日理发师 人人受尊敬

解放后，工人当家做主人，我們理发工人彻底摆脱了資本家的残酷剥削，生活得到根本的改善，并且一天比一天好，永远結束了“生活如花子”的苦日子。在旧社会，我們夫妇两个人干活还养不起一个孩子，現在我們两个人工作，一家五口人，孩子上学，要吃有吃要穿有穿的。在旧社会生病就失业，就要当卖衣物，前年我害一次重病，領導和同志們都来看我，还把我送进医院。出院后，又把我送到白魚口工人疗养院休养，在医病和休养期間，工資送到我家中。旧社会和新社会，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新社会也永远結束了我們被侮辱被歧視的命运。我們

理发工人成为光荣的服务人員，受到人們的尊敬。經過党长期的培养教育，我于1959年入了党。有一次省委开三級干部會議，調我去理发，首長們个个笑嘻嘻地喊我老姜同志，亲热地和我握手，真使我笑在眉头喜在心間。現在顧客称我們為理发师，工作做得好一点还受到表揚。有的人現在还說干理发是“侍候人的工作”，“低人一等”。在新社会說这种話那就錯了。我們現在侍候的不是“老爷”、“太太”，而是劳动人民。再說，別人也同样侍候我們，為我們服务。比如京剧演員来理发吧，是我“侍候他”，他坐着我站着。晚上我看他演戏，我坐着，他演着、唱着。你能說誰侍候誰，誰“低人一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分工不同，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每一样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光荣的。我十分热爱我的工作，我感到十分光荣。我决心好好干一輩子，带好接班人，这样才不辜負党对我的希望。

楊樹整理

一个女工的控訴

—平浪盐矿女工 万福秀

万恶的旧社会，害得我从小失去双亲。我的家乡在哪里，父母姓名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只认得我的小名叫秀兰。反动派把我当做商品辗转贩卖七次，多亏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才得到了翻身。

自幼失去亲爹娘

我三岁那年，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兵、拉夫，父亲为了躲兵，在外面东奔西逃，不敢归家。一天晚上，父亲偷偷地回来看望我们母女，不料被伪乡公所的爪牙看见，这些家伙就闯进我家，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捆走。媽媽急得嚎啕大哭，我从梦中惊醒，吓得也哇哇地哭起来。从此，我失去了亲爱的爹爹。

父亲被抓走后，媽媽整天伤心啼哭，一双眼睛哭成了“烂桃子”，眼泪都流干了。狠心的恶霸趁火打劫，欺我